

冷战后日本 对台湾政策研究

巴殿君 著

冷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研究

巴殿君 著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研究/巴殿君著. —北京: 九州
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5108 - 0333 - 8

I . ①冷… II . ①巴… III . ①对华政策—台湾问题—
研究—日本 IV . ①D831. 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7514 号

冷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研究

作 者 巴殿君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19/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0333 - 8
定 价 38.00 元

序　　言

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问题，遏止“台独”势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这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核心利益。台湾问题也是涉及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影响因素。台湾问题不仅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也是中日关系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历史上，日本曾侵占台湾50年，形成了复杂的历史关系。冷战时期，在中日建交之前，日本追随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扶植台湾当局，公开阻挠两岸统一进程。冷战结束后，美国依据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实行保护台湾政策，执意向台湾出售武器。日本则采取一种介入政策，在美日同盟框架内，把台湾列入日本周边安全区域。日本的一些政客和右翼团体更是居心叵测，为“台独”势力推波助澜。因此，日本成为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本书从国际体系与日本外交政策变化入手，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国家战略定位与选择，日本台湾政策的发展变化；分析了日本长期觊觎台湾，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相关领域的渗透与“介入”；基于日本对台政策双重性特征，勾画出其对台政策的走向，提出了应对之策。

研究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日本政府、政党、团体和一些日本人士对台湾的政策、立场、动态、特点和走向，在维护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大局前提下，努力排除日本方面的各种干扰因素，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研究日本台湾政策，这是一个难度很大，也较为复杂的敏感领域。近几年，巴殿君利用多次到日本讲学或从事研究的机会，从日本国会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收集了有关日本政党、国会议员与台湾交往的最新、最详尽的档案资料。他与日本社会的各阶层广泛接触，其中包括与政界人士进行访谈和交流。他从历史到现实，系统地梳理、分析了日本对台政策的来龙去脉。研究了日本政府、政党，以及多党背景的亲台政治组织对台政策的变化，及其发生的社会基础。

巴殿君博士通过对第一手材料的深入系统研究，透彻地分析了日本的对台政策与变化，此为“求事”；通过对日本对台政策的背景、特征、趋势的交待、

梳理与分析,揭示其对台政策的本质,此乃“求是”。内容设计上的“求事”“求是”风格,也是这部著作一个突出并值得肯定的特点。

《冷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研究》是巴殿君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它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对台湾政策,填补了我国这个领域研究的空白;在大量一手资料基础上,深入透彻的分析了日本台湾政策动向及其影响,提出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对策性建议。

他为这部著作花费了6年时间,在过去的岁月里,他坚忍不拔,表现出一种学术执著和探索精神。借此书出版之际,我作为巴殿君的博士导师,向他表示衷心祝贺!祝贺他在日本台湾政策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在这个研究领域作出的学术贡献。

刘清才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0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冷战后国际体系转型与日本外交政策	(1)
一、冷战后国际体系的转型	(1)
二、冷战后日本国际地位的再定位	(12)
三、日本的战略选择与台湾问题	(19)
第二章 冷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的变化	(30)
一、日本对台湾政策的演变	(30)
二、冷战后日台“准政府”关系的提升	(44)
三、冷战后日台政党交流的扩大	(56)
第三章 日本与台湾的安全关系	(67)
一、日美安保体制下的日本对台湾安全政策	(68)
二、日美安保再定义与日台安全关系的调整	(80)
三、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与日台安全关系新动向	(89)
第四章 日本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关系	(104)
一、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政策	(105)
二、日本与台湾的经贸关系	(111)
三、日本对台文化政策与文化交流	(122)
第五章 日本对台政策走向与中国的对策	(134)
一、日本对台湾政策的双重性	(134)

冷战后日本对台政策研究

二、日本对台政策的未来走向	(140)
三、中国的战略对策与政策选择	(159)
结 论	(178)
附录：中日两国间涉及台湾问题的条约及文件资料	(182)
参考文献	(192)
后 记	(205)

第一章 冷战后国际体系转型与日本外交政策

日台关系对中日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以及东北亚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冷战后，在国际关系发生巨大调整的情况下，国际格局的态势、国际议题的重心都发生了革命性改变。在国际关系重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在寻求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日本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其国际行为需要战略性规划。台湾问题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链条，其作用形式和重要性都取决于日本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一旦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台湾问题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就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只有在具体的国际环境中，对日台关系加以考虑才有意义。

一、冷战后国际体系的转型

(一) 两极格局的瓦解与一超多强的新格局

国际格局既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理论概念，又是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现实。有关国际格局的定义，中国学者进行了许多界定。李义虎先生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结构定义对比的角度，认为“体系中的权力排列、能力分配状况或相互关系形式就是国际格局，又特指国际格局中的力量对比。”^①金应忠、倪世雄先生则认为：“种种国际战略力量之间交互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力量对比关系，它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国际关系格局。”^②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判断，但却同时坚持了两点共识，那就是：1. 国际格局对国际体系的发展与态势有着很强的规范作用。2. 国际格局主要是由一定时期内对国际局势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

汉斯·宾尼恩迪克把国际体系的格局分为五类。但具有典型意义，并为人们熟知的国际体系结构，仍然为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种。冷战时期，美苏对峙是一种典型的两极格局。冷战结束，来自前苏联的威胁迅速消解，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失去了竞争对手。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美国的

^① 李义虎：《国际格局的定义前提及其基本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3期。

^②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版，第218页。

经济力量、军事实力、科技水平与文化影响力等,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没有哪个国家可比。而且,这种总体实力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如此实力悬殊的情形是从未有过的,从未有过。”^①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性,体现了国际体系的单极特征。顷刻之间,两极世界完成了向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的演变。但回顾近17年国际局势的发展历程,拥有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美国,并没有完全掌握世界发展方向,美国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在伊拉克、阿富汗及东亚的朝鲜并没有产生效果,反而使国际形势越发难以控制,美国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国的外交影响力陷入“功能性障碍”的困境,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积极推动“世界新秩序”,却导致了一个“无秩序的新世界”。^②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发展具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特征,一方面美国的实力优势异常明显,远远的将其他国家甩在身后;另一方面,美国却又异常脆弱,无论是反恐事务,还是应对金融危机,它都难于独自解决与自身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没有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的与美国缺乏密切联系的地区和世界强国)的合作,美国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传统的单极结构,“是指由某一个主要的大国(霸权国)或国家集团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该国周围存在着一系列其他主权国家,但并不能成为与之抗衡的政治力量。”^③但是,冷战后,美国有时显得无比强大,有时又异常脆弱的现象,使人们对传统单极格局的定性提出了质疑。愈来愈多的人认为,当前单极格局下,美国的主导地位不是绝对的,面临着许多局限和挑战。法国学者蒙布里亚尔就认为,美国单纯依赖自己的实力,明显无法独自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其论点有三个:“(1)一个国家再强大也只能集中精力解决很有限的问题,这是常识;(2)经验表明,美国的实力恰恰是使它犯下很多错误的原因,而这些错误又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些后果反过来又制约了美国的实力;2003年至今美伊战争的情形就是例证。(3)美国自身的民主体系也是个制约因素。众所周知,美国每两年进行一次选举,11月份进行中期选举,公众舆论对美国对外干预行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对外干预行动过于雄心勃勃或不能迅速收效,公众舆论导向就会马上发生变化。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是

① [英]《伦敦金融时报》,2002年2月1日。

② [日]寺田正臣:《美国外交因看不到敌人而迷失方向》,2006年10月30日。

③ 孔庆茵:《世界格局的三种模式分析:单极、两极与多极》,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55页。

明显的例证。”^①

冷战后,单极格局的这些特征表明,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单极格局,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形成。在美国一超独大的局面下,国际体系还存在大量新兴力量,在地缘关系上,使各个区域的内聚力和独立性大增。这些力量,在政治上,多元观点的表达成为常态;在经济上,对国际事务的发声不容忽视。国际格局的这种单极多元态势,正在向多元化缓慢过渡。美国的脆弱性和有限性表明,要支撑“独大”局面,需要更多的依赖世界性和区域性盟友来分摊霸权成本,分担国际责任,当然也同时要让人家分享霸权红利。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科技和产品的重要提供者,还肩负了为美国平衡亚太事务的重要功能。在世界权力重新分配的态势下,存在着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战略诱惑。

目前,有关国际体系现状与发展趋势的讨论,十分活跃,众说纷纭。除了比较常见的“单极”、“多极”论之外,近来一些新的提法比较引人关注,其中包括“无极世界”、“东西方两极”、“集极”说等。“无极世界”的主张认为:21世纪国际关系一个重要特点将是无极秩序:世界不再由一两个或多个国家支配,而是受几十个拥有并运用各种力量的角色控制。无极国际秩序,以无数重要力量中心为特征,有别于有多个截然不同的极或力量聚合体的多极秩序,也不同于以两个力量聚合体为中心的两极秩序。^② 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地区和危机中,由不同的国家或联盟担任领导“无极世界”的责任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国际机构不仅仅在安全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还把国家层面的决定和活动余地,推到超国家层面。^③ “东西方两极”的主张认为:全球化将出现东西方两极,东方的一极无疑是“中国”,而美国作为西方的一极,至少在未来10年,也会像中国的地位一样稳固;^④ 此外,还有主张未来国际体系为“集极”的,他们认为,21世纪国际体制不会是美国单极的支配状态,可能是建立以美国为中心,集结多个中小规模“极”,汇聚各“极”力量的新世界体制。既非“单极”,亦非“多极”,也非“无极”,而是“集极”。^⑤ 但无论是“单极”、“两极”、“多极”论,还是“无极”、“集极”的提法,表明21世纪国际

① [美]蒙布里亚尔:《美欧关系》,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14页。

② [美]理查德·哈斯:《无极时代》,《外交季刊》,2008年第5期。

③ [德]亚当·罗伯茨:《谁来统治无极世界》,《国际政治》2008年第4期。

④ [美]罗伯特·J·夏皮罗:《未来预测:超级大国、人口和全球化将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美国在线杂志《全球主义者》,2008年6月21日。

⑤ [日]春原刚:《集极的时代——21世纪美国外交和G8峰会的走向》,日本《外交论坛》,2008年7月号。http://www.xjass.com/zys/content/2008-11/14/content_40639.htm

体系正在形成,既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对立,也并非完全是美国单极结构。从权力因素上看,“一超多强”勾勒出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而从权力分配的趋势上看,“多极化”将是今后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

(二) 国际议题由和平向发展的转化

两极体系向多极体系的转化,不仅仅是单纯的权力结构的转化,也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内容。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在谈到两极体系时认为:这种体系可能不会比多极体系更不稳定或更好战,但它却受到大规模无情战争更为严重的威胁。实际上,如果所有政治单位都分别隶属于两大阵营中的某一个,那么任何一个地区冲突都将关系到整个体系。^①但是,随着铁幕的瓦解,被认为分隔的世界,再一次开始了沟通。国际大战的风险一旦降低,新的权力格局下,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也随之发生改变。刘永江先生认为,冷战后,虽然“某些国家的国际安全模式并未完全摆脱同盟的形式,但两大军事集团对抗业已消失,联合国与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作用增大。对国际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角色是多元化的国际力量与国际组织,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多元力量。世界经济体系的区域化与全球化趋势加强。国际关系的性质是相互依存方面的因素上升,而权力政治的因素相对下降。国际间竞争的主要形式是经济、科技竞争,而战争形态则主要是内战与局部战争。”^②在后冷战时代,短时期内,一个新兴大国挑战美国地位或者美国因为霸权考虑向一个新兴大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在安全困境得以缓解的情况下,抑制国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消除了。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成为大趋势,发展超越和平,必然成为新时代全人类追求的核心议题。

当发展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之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自然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国家间为争夺优势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开始由传统的安全领域向经济领域外溢,竞争的逻辑也由威慑、军备竞赛,转向经济规则的制定、经济机制的建设。国家开始重新协调自有资源,在一种新的逻辑支配下从事国际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由单纯的国家政策的附庸,转向更有活力的国际事务参与者。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国际合作的过程,大量的国际合作使国家间的关系协调显得更为必要。为了推进国际对话

^①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p. 139.

^② 刘江永:《未来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7页。

与合作,就必须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以制度性安排,整合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这就是国际协调与国际制度所关注的问题。^① 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专业化分工的细化,又进而推动了国际体系不同功能领域的独立性。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间权力的对比和衡量变得更加困难。尽管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能力仍然可以外溢至其它领域,但外溢中的损耗却日益增大,这就使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经济秩序开始出现某种独立于政治秩序的特征。在世界经贸组织中,一个小国也可以利用公认的规则向美国这样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提起诉讼。这种明显的趋势说明,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尽管国际经济秩序仍然充满了不公正,但其重组和调整的力度都大大超过了国际政治领域。

正如复杂的生物系统一样,国际政治体系也要经历其生命周期:诞生,初期的变动性,随体系的成熟而更为固定,最终毁灭。^② 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在这种生命周期中不断循环,进而使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体系,常常呈现出沃尔兹所说的“相似性”特征。但是,与国际体系的相似性相比,新的特征对预测和判断国际体系的发展态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果说,站在权力结构调整的角度看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与历史上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么,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则代表了国际体系变革性的一面。从单纯的经济数据分析,一战前,全球化的发展就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各国间基于经济联系而达成的全球化进程受到极大挫折。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与一战前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相互依赖跨越了经济领域,向国际社会更深层次发展。基欧汉和奈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旧的国际格局正在崩溃,旧的口号日益失效。世界各国在经济、交流和人类理想等方面已变得相互依赖了。”^③

国际社会的深入发展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后果极为广泛。首先,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的重要性降低了。对愈来愈多的人而言,国家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是被当做制造问题的麻烦加以批判。国际组织和制度、跨

^① 汪晓风:《从相互依赖到全球化——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国际论坛》,2002年第4期,第47页。

^② [美]汉斯·宾尼恩迪克:《冷战后时代的国际体系:回到两极?》,《国际论坛》,2001年底3期,第78页。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冷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研究

国公司等一些新兴行为体与国家相互作用，只有在与这些行为体有效合作时，国家才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国家重要性的相对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行为模式的改变，将国家力量集中于军事力量建设的做法不再适用，国家实力更多的体现在其对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和对跨国公司的管控能力上。苏联作为军事强国的瓦解，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国力衡量标准的变化，使像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新时代条件下，其地位与作用更加凸显。

其次，国际社会的发展，使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界限模糊。亨利·基辛格在《一种新的国家伙伴关系》中指出，“方兴未艾的社会和经济交往正产生一个无国界的世界”。传统国际事务是由国家独自掌握，但国际社会的发展，使民众日益参与到方兴未艾的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进程当中，民意直接影响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国际事务以及各国外交政策的民主化趋势日益明显，民众参与，极大的影响了国际事务的规则。国家执行外交政策的能力，日益取决于民众的支持程度。就像在此次全球经济衰退当中，尽管避免出现全面贸易保护已经成为各国政要的共识，但工会的强大阻力，依然使美国、法国等国家的政府感受到强大的贸易保护压力，各国也因此出台了很多自相矛盾的政策。民意的掣肘，实际上就是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最明显的作用之一。在当代国际关系当中，争夺全球民意，争夺舆论支持，已经变成国家外交战略成功的关键因素。从国际社会的角度衡量，日本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一方面，它在东亚、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显得十分孤立，该地区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印象深刻，且积怨颇深；另一方面，在东亚区域以外的民间，日本却有很高的支持度。长期坚持的人道主义援助政策以及国家文明程度，给世人留下的深刻感受，都成了日本跃升为国际政治大国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国际议题、功能区域日益细分的国际体系中，综合性大国固然存在，不同领域的强大国家也同样积极参与其中。这种趋势是由新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由不同领域组成”的推论所引发的现实结果。日本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大国、强国，在国际政治领域长期处于软弱的地位。冷战时期，其国际地位被定义为美国的附庸。但是，冷战后，在经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功能领域的时候，日本在经济、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所能带来的政治“外溢”效应，比过去显得尤为突出。在国际经济相对独立于国际政治领域趋势日益明显的后冷战时代，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其国际地位的提升也具有了更多的机遇。虽然在同为东近邻的中国的比较下，显得黯然一些，上升势头经常被人们低估，但实

际上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 东亚区域体系的变化

东亚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它既是地理概念,也有地缘政治与区域经济的内涵。在当代国际体系结构中,这一地区交叉着多层次因素:这里既创造了二战后世界上最辉煌、最有活力的经济奇迹,也遗留下冷战中随时可能引发的危机甚至战争的热点问题;这里既是大国关系最集中、最复杂的地区,也是未来有可能改变国际格局,形成世界多极化的一个重要看点。

1. 东亚区域内的国家关系

东亚作为国际体系内部权力最集中的地域,当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经历重大国内变革。这种变革取决于各国的政权性质,也将影响各国对外战略的转变。国家内部的变化,势必通过其国际行为,影响到地区与国际体系前景。中国的和平发展、日本的“正常”国家转变、俄罗斯的东山再起,不仅影响东亚地域的未来,也将关系到东亚国际体系的稳定。

东亚区域内的国家关系表现为多边的、双边的与单边机制。尽管多边进程有所发展,如,六方会谈等,但现有的双边与多边地区机构,并没有在实质上消除区域内的安全困境。这一区域,目前的政治环境,不具备欧盟式的地区政治安全结构,即建立在共同的历史、价值观,以及对安全问题的共同预期等方面的环境因素。区域内的大多数的国家关系,还表现为双边与单边的关系。大国之间的不信任及其双边的同盟关系,构成区域合作及地区机制形成的主要障碍。长期来看,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结构,对地区性机构的形成及其多边进程的扩展产生了阻碍作用。

目前,中美关系是左右这一地区政治环境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未来的5—10年里,国际影响力还会增大。在这一地区,中美两国在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与经济领域,都拥有根本性的利益。中国与美国若能客观地处理之间的矛盾,双边协作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但问题在于双方缺乏互信基础,这将给双边及区域内的政治、安全环境带来深刻影响。

日美关系是影响这一区域政治、安全环境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未来一段时期,日本会继续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轴来平衡与区域内各国的双边、多边关系,其国家战略将会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演变。伴随日本的经济复苏,它会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安全活动。日美会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增强对东亚地区安

冷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研究

全与政治的影响力,但伴随双方国家战略的调整,同盟关系也必将出现一定的分歧。

伴随国内政治的变化,俄罗斯的东亚政策具有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国际能源紧张,促进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使俄罗斯更轻易地使用能源这一武器,构建与区域内各国的双边关系,使其对外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强硬。中俄关系会继续得到发展,并对美日在这一区域内的存在给予有力的牵制。此外,朝鲜半岛与东盟也是影响东亚安全、经济与文化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东亚区域内国家关系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失衡:一是权威结构的缺失,即区域内缺少各国一致认可的、规范各国政治行为的制度与机制。东亚地区缺少可以在区域内有效消减紧张关系的多边机构与机制。如果不能发挥东亚各国的政治智慧,很难化解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现实利益纠纷而产生的紧张形势。二是权力结构的失衡。冷战时,两个阵营内的不同国家,分属不同集体安全组织(华约与北约)。随着华约的解体,许多“华约”成员争先恐后的加入“北约”。但在亚洲,日美同盟不仅没有伴随冷战结束而解体,反而进一步强化,日美韩的三边安全机制也得到加强。在这一背景下,尽管东亚地理上的军事界限没有发生变化,但实际上,实力对比已经出现严重失衡。这种“北约”东扩与美日安保强化的结果,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俄罗斯、日美韩三边安全合作对朝鲜及中国构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可以说,这种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权力”失衡,导致东亚安全格局发生了严重的倾斜。

东亚国家关系在 21 世纪有可能出现重大改变,其主要原因是,作为对国际秩序拥有关键影响力的美国,正在调整全球与东亚战略。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保护本国及盟国的利益不受威胁。在东亚,美国通过美日同盟,涵盖军事、经济与政治利益。后冷战时期,尽管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对手,并强化美日军事同盟,但区域内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却亟须中美间的协力合作才能解决。这一趋势,有可能导致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是美日同盟在军事上强化了对朝鲜、中国的围堵,尤其是使台湾问题复杂化,有可能引发中国与美日的一场新冷战。二是由于中美合作的加强及其外延的拓展,一旦朝鲜半岛与台湾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可能会重新崛起,这可能恶化美日同盟,使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出现新的演变。

21 世纪,整个东亚区域体系将会发生深刻变化,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相比,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对垒鲜明,

同盟之间有着共同的威胁与安全目标,规定了明确的前景与义务。而现在,由于威胁的多元化和不断变幻,各国的战略目标随之改变,世界进入了“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的时代,国家之间也变成了“选择性合作”的关系。^①以往的同盟关系面临新的考验,曾经的伙伴变成了对手,以往的对手有可能演变为有限的伙伴。这种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增加了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难度,同时也使国家之间的合作变得更有选择性。

2. 东亚区域体系的特征

各大国的权力角逐与利益纷争,使冷战后的东亚地区表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特征。竞争是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合作是共有利益使然。

东亚的区域体系结构与该地区存在的三种政治安全结构模式密切相关。“通过对冷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十年演变的观察,我们看到这里基本上出现了三种略见成型的政治、安全模式:多极模式、霸权稳定模式和多边安全合作模式”^②。这三种模式,在东亚地区都有存在的根据,同时构成了东亚地区多元、复合的政治安全结构特征。

多极模式是多极力量相互制衡的一种状况。在东亚地区,多极模式体现得最为明显。俄、美、中、日四大力量是世界公认的五大力量中心的组成部分,俄罗斯、中国、日本都可视为该模式的受益国家,尤其中国和俄罗斯是比较积极的提倡多极化的国家。有能力在东亚地区寻求霸权稳定模式的国家唯有美国。美国在有条件的遵守均势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向霸权稳定的模式前进。在多个场合,美国都强调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超级大国作用和地位。“在许多情况下,美国是唯一能够在对共同的挑战做出国际反应时担当必不可少的领导和具有这种能力的国家。美国在世界发挥领导和参与作用对我们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③。多边合作模式的主要倡导者是东盟,这种模式的宗旨在于防止成员之间的歧视和不信任,通过有透明度的政策,促进成员国和平解决彼此的争端。

这三种政治安全结构模式,是东亚地区大国之间基于现实状况所形成的权力目标,是不同国家根据自身力量制订的地区发展远景。这三种模式的冲突与共存,反应东亚地区各种力量中心之间复杂的关系模式。这些力量之

① [英]查德·哈斯:《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了》,《国家利益》,2008年第1期。

② 倪峰:《论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第7页。

③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December 1999.

间,既有矛盾与分歧,也存在合作的利益诉求。“地区内大国权力分配格局是构建地区秩序的决定因素和物质基础”^①。在东亚地区各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及利益诉求,最终决定了东亚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区域体系特征。

东亚竞争的区域体系特征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布热津斯基认为,造成东亚不稳定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台湾问题、围绕南中国海的南沙和西沙群岛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日俄北方四岛问题等。这些地区热点问题和国家间领土纠纷,是大国之间竞争及冲突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被称为是美国欧亚战略的“远东之锚”。世界主要大国在东亚的利益争夺和权力角逐,使该地区具有明显的竞争与冲突的倾向。“目前东亚地缘舞台的特点是,大国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今天的远东既有非同寻常的经济活力,又有越来越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事实上,亚洲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是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因为繁荣掩盖了该地区的政治脆弱性,尽管繁荣提高了民族的雄心并加大了社会的期望值。”^②

经济的繁荣,使东亚地区的国家实力急剧增加。在东亚狭小的空间内,迅速崛起的大国之间,难免形成相互威胁与猜忌的心理,再加上该地区的各种热点问题和领土争端,使任何一丝的不和谐音符都有可能造成地区环境的恶化。这些因素,使相互竞争与防范的东亚地区特征,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正如谢尔顿·西蒙(Sheldon Simon)所指出的,“迄今为止,主导性的东亚安全研究还是基于现实主义。那就是说,最终的和最重要的,东亚国家都会继续保护它们的主权”^③。所以,很多学者都将主权至上的东亚国家关系,比作17、18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国家之间长期征战与对抗,将主权视为不可侵犯的信仰,现在的东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相类似。

竞争与冲突的存在,并非表明东亚地区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与现实。实际上,在地区主义蓬勃发展的国际环境下,东亚的地区一体化和国际合作趋势,也取得了日益明显的发展。有些学者认为,竞争或者说冲突与合作是互

^① 刘昌明:《美国的不完全霸权与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2期,第40页。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③ Sheldon Simon, ed., The Many Faces of Asian Security, p. 3. 转引自朱锋:《“区域性”特征与东亚安全研究》,《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第67页。